

六
廣
文库

古代文体学 思辨录

欧明俊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古代文体学思辨录

欧明俊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体学思辨录/欧明俊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01-013868-8

I. ①古… II. ①欧…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文体论-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8683 号



古代文体学思辨录

GUDAI WENTIXUE SIBIANLU

欧明俊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

字数:365 千字

ISBN 978-7-01-013868-8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六 文庫

排序按作者姓氏笔画:

马重奇《汉语音韵与方言史论稿》

朱 玲《中国古代小说修辞诗学论稿》

张善文《学约斋文录》

李小荣《晋宋宗教文学辨思录》

陈庆元《文学文献:地域的观照》

陈泽平《福州方言的结构与演变》

林志强《字学缀言》

欧明俊《古代文体学思录》

祝敏青《文学言语的修辞审美建构》

涂秀虹《叙事艺术研究论稿》

郭 丹《经典透视与批评》

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



序

陆游诗曰：“呜呼大厦倾，孰可任梁栋？愿公力起之，千载传正统。”（《喜杨廷秀秘监再入馆》）这四句吟论，反映了诗人对传统学术正脉的孜孜追求，也俨然是中国古代正直知识分子学术情操的典型写照。清儒方东树所谓“表人物，正学脉，综名实，究终始”（《刘悌堂诗集序》），方宗成云：“标名家以为的，所以正文统也”（《桐城文录序》），皆合斯旨。因此，我常想，对先辈优秀学者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承传其学术，弘扬其文绪。

一所百年高校，必有深厚的学术蕴蓄。福建师范大学创校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百余载间，英贤辈出，晖光日新。若如国学宗师六庵先生者，其宏敷艺文的纯风休范，允属我校文学院在特定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学术标帜。记得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撰诗有“及门子弟追洙泗，开国文章迈汉唐”之句，多年来为学界识者所激赏，盖缘诗句抒发了一位敦厚学者对所从事的教学和著述事业的豪迈情怀。

先师六庵教授，姓黄氏，讳寿祺，字之六，自号六庵，学者称六庵先生。民国元年（1912）生于福建霞浦，公元1990年卒于福州。早岁游学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师事曾国藩的再传弟子尚节之（秉和）及章太炎的高足吴检斋（承仕）等著名学者。曾执教于北平中国大学、华北国医大学、国立海疆学校、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等高校，1949年以后，长期担任福建师范大学（初名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兼任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文学学会会长、福建诗词学会会长、中国周易学会顾问等。先生毕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敦于培才，勤于著述；精研群经子史，尤深于《易》；通贯诗律，博瞻文词。有《群经要略》、《易学

群书平议》、《汉易举要》、《周易译注》、《楚辞全译》、《六庵诗选》等行世。

学科建设,固需旗帜,更需队伍,尤其是组建能承前启后的优质学术团队。我校文学院各学科的建设多年来卓有成效,蜚声海内外,端赖于有这样的体认和措施。如现代文学学科以桂堂先生为旗帜,形成了坚壮的学术群体;古代文学学科以六庵先生为旗帜,聚合着谨实的科研力量。今文学院以六庵、桂堂的名义编为文库,分别据采古代与现代文学两大学科群中诸多学者的学术成果,汇集出版,其用意宜颇深厚:既可纘绍前修,又堪率勉后学,于我院将来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及与学术界的多方交流共谋进步,应当均有重要意义。

《六庵文库》初辑,汇合了我院古代文学学科文学专业与语言专业十二位教授的学术著作,人各一集。其中治古文学专业者六,有陈庆元《文学文献:地域的观照》,述八闽文学之史迹;郭丹《经典透视与批评》,探索先秦两汉文学经典之源头与精华;李小荣《晋宋宗教文学辨思录》,寓佛道文学之潭思;欧明俊《古代文体学思辨录》,作各类文体之谛辨;涂秀虹《叙事艺术研究论稿》,论古代小说戏剧叙事之精义;拙稿《学约斋文录》乃滥厕其间,略抒关乎旧学的些微浅见,未足道也。治语言专业者亦六,有马重奇《汉语音韵与方言史论稿》,判析音韵而兼及方言;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宏拓修辞而绎寻新义;朱玲《中国古代小说修辞诗学论稿》,推扬修辞而衍及诗学;陈泽平《福州方言的结构与演变》,专注一域而精研其语;祝敏青《文学言语的修辞审美建构》,立足文学而考鉴修辞;林志强《字学缀言》,辨字考文而泛涉金石。凡诸家所论撰,皆不离本学科范畴,其学术造诣之浅深若何,固有待于学界确评,但其中所呈现的克承前辈学风,商兑旧学、推求新知的精神,则是颇为鲜明的。

我曾忝列六庵先生门墙,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即留校任先生的学术助手,直至先生辞归道山。回思数十年的为学历程,每前行一步,都凝聚着先师培育的心血。今承命为《六庵文库》制序,不胜厚幸之至,因就文库的编纂始末,略书数语,以赞明其意义。同时,也藉此企望与学界同道共勉互励,取长补短,为踵继先辈学者的优良学风,“传正统”、“正学脉”,而共同奉献绵薄之力。

张善文谨述于福州

公元2014年7月岁在甲午大暑后三日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 001

第一章 古代文体学体系的建构

古代文体学的学理构成 / 019

古代文体“自娱”功能论 / 035

古代文体价值论 / 049

第二章 古代文体特征论思辨

古代文体疆界及异同 / 067

古代文体的“正”与“变” / 081

古代文体的“破体” / 092

古代文体特色综论 / 104

古代文体的关联性研究 / 116

第三章 古代散文文体学思辨

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 / 133

古代散文概念“前理解”之反思 / 153

古代骈文界说之反思 / 162

晚明人的“小品”观 / 171

古代散文史研究中的“遮蔽”问题 / 191

古代散文史撰写新构想 / 208

学术视野中的古代文章学 / 220

第四章 古代诗体赋体词体学思辨

古代诗体界说之清理与反思 / 241

赋体研究之反思 / 256

词体起源及发生研究之反思 / 266

论词体观念的嬗变 / 274

论清代词学中的“自批评” / 287

刘永济《词论》对现代词体学体系建构的贡献 / 301

论吴世昌的词体观 / 308

附录 问学小言续 / 318

引用书目 / 337

后 记 / 359

绪 论

“文体学”译自英文 stylistics。英文 style 概念涵义丰富,可指某一作家使用语言的习惯,或指某一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文风,或指某种体裁的语言特点,或指某一作品的语言特色,兼有文体(或语体)和风格两方面含义,一般译为“风格”,其实“文体”更近乎 style 的英文原意,故现通行译作“文体”。相应地,stylistics 译为“风格学”或“语体学”或“文体学”,“文体学”译法比较通行。目前学界,不同学科对“文体学”内涵皆有各自的理解:或认为是一门研究文本体裁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或认为是文学研究一个分支学科,或是文艺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是研究散文所表达现来的语言形成的学科,或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或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等等。可以说,不少学科皆有自己理解的“文体学”。

中国古代,有独具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文体学,虽无其名,而有其实。文体学本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 20 世纪初“新文学运动”以来,由于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狭隘化理解古代文体,古代文体学研究显得异常冷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才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成为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经学界同仁的不懈努力,目前,古代文体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文学遗产》2005 年第 1 期),论证了古代文体学学科的基本内涵与对象,勘划了学科的大致范围和性质,认

为古代文体学大体上包括古代文体史料学研究、古代文体学史研究、古代文体史研究、语体与语言形式、作为“风格”的文体学研究、古代文体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研究等。论证了古代文体学与其他学科如古代文学、现代文体学特别是现代西方文体学的互动关系,强调要整体把握文体、解会文学,确立古代文体学在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结构中的适当位置。吴承学先后著有《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02年增订版)、《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特别是后者,对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了完整和系统的梳理,是对中国传统文体学的“回归性”研究。钱志熙《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前文特别强调本体与分体之结合,才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之全部。所谓体裁、体制,是总的文学之体分出的个别的文学种类之体,而在这一层次上的“体”,是对文学之体的具体化,但却并没有剔除文体一词的那一层本义。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将文体完全与体裁等同起来,将文体问题简单化为体裁的问题,其实是抓住文体学的末,而放弃了文体学的本。罗宗强《我国古代文体定名的若干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论述了古代文体体裁之生成与称名之不同标准、体貌称名之特点、体裁与体貌之复杂关系、文体定名中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等问题。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理论层面上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文体基本结构各个层次的构成、特征和功能等方面的精到论析,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和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三个方面,清晰地勾勒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的基本面貌,并探讨了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原则和规律,以及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的文化背景。主张从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方面把握古代文体形态。王长华、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的价值序列》(《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角度研究文体,认为古代文体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与礼仪制度、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价值序列,众多文体因自身不同的社会功用而分列于不同的位置,乃至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尊卑高下的价值等级。这个价值序列从属于正统文化,其中所渗透和包含的价值评判对文人及文体具有

超乎寻常的控制力和威慑力,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人心态和文体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10年第7期)对中国古代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揭示文体生成阶段的基本属性,找出相类似文体彼此之间的细微差异,对文体名称最大限度地进行历史还原,找出它的原始本义、引申义以及与文体名称之间的关系。认为文体的生成具有多源性,要跨越文体的界限进行探源。李建中《中国古代文体学范畴的理论谱系》(《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追溯中国古代文体学范畴之“元”(起源与本原),建构起以“用”为华实、以“言”为主干、以“體”为根柢的理论谱系,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范畴的本体论价值。又《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强调指出,中国古代文体学并非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分支,而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本身,是一整套具有本体论价值的文学观念和言说方式,其本体论价值是以“體”为中心生成并展开的。曾枣庄《论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认为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体裁,而应包括体裁(不止是诗文体裁,还应包括经、子、史,特别是史书的体裁)、体格(风格)和体类(即《〈文选〉序》所说的按体裁、题材和时序分类)。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上卷《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下卷《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综合体裁、体格、体类几个方面来论古代文体,厘清了一些观念,消解了一些争议。张慕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文史哲》2013年第4期),认为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本体性问题。尹相如《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源流》(《昆明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则主张文体学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是专门研究各种文体的性质、特点和源流的一门学科。

诸海星《中国文体分类学的研究》(台湾师范大学1992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常新《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黄震云、任振镐《论中国文体形态与文体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沈金浩《文体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姚爱斌《论中国古代文体论研究范式的转换》(《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朱迎平《宋文文体演变论略》(《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杨旭《“文体”

的涵义和宋代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增第2期),许结《论中国古代文体的历史演变与现代意义》(《天中学刊》2013年第3期),胡大雷《“言笔之辨”与古代文体学》(《学术月刊》2013年第10期),黄念然《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的特点及其文化成因》(《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论纲》(《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吴承学、何诗海《浅谈中国古代文体价值谱系》(《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6期),等等,皆是重要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文体学做了深入探讨。

有学者对古代文体学一些重要概念如“正体”、“变体”与“破体”进行辨析,有吴承学的《辨体与破体》(《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王水照的《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曾枣庄的《论宋人破体为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2期)、《中国古典文学的尊体与破体》(《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张高评的《破体与创造性思维——宋代文学之新诠释》(《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

断代或专题文体研究成果有如,于学棠的《先秦两汉文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后出站报告)、郗文倩的《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以汉代文体为中心》(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李士彪的《魏晋南北朝文体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贾奋然的《六朝文体批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古代文体学分体研究更不断深化、细化,如谭家健的《关于古典散文的若干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1980年),熊礼汇的《古代散文的文学性》(《先唐散文艺术论》第一编第一章第四节,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杨庆存的《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考》、《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宋代散文研究》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马茂军的《中国古代“散文”概念发生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莫道才的《骈文名称的演变与骈文的界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谭家健的《关于骈文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等,对散文、骈文概念做了清理辨析;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专著中关于史传文体的研究,马自力的《语录体与宋代诗学》(《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对语录体的研究,刘尊举的《明代八股文的体制与文风演变》

(南开大学 2008 年博士后出站报告)对八股文概念的界定和八股文体研究,阮忠的《两汉讽颂赋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 5 期),王长华、郝文倩的《汉代赋、颂二体辨析》(《文学遗产》2008 年第 1 期)对赋、颂二体的辨析,郭英德的《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对传奇戏曲文体的分析,马自力的《历史与小说——小说观念发展略论》(《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对小说文体演进的探讨,等等,皆极有深度,此不赘述。

古代文体学文献研究也取得突出成绩,曾枣庄《论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清华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认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文本的体、格、类的形成、特征、演变及其分类的学问。因此,全面占有资料是文体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古典文体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全面占有经、史、子、集有关文体资料的基础上,不能仅凭文论专著(如《文心雕龙》)和诗文评著作研究文体。党圣元《唐宋类书“文部”的文体文献学价值》(《文化与诗学》2011 年第 1 期)认为唐宋类书“文部”胪列评论文体的体例在中国古代文体纂述体例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独到地位。从唐宋八大类书所引古代文体书目之数量和频次分析中发现,唐初类书编纂者的文体意识还不是很强烈、很主动;到了宋代,诸如《太平御览》等类书编纂的文体理论意识逐渐增强,从中也可以看出《文心雕龙》等文体论著在宋人眼里要比唐人看得更加重要。作为“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藪”,中国古代类书尤其是唐宋类书最丰富、最集中、最系统地把中国古代文体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具有“综罗文体资料文献”的功能。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附卷《中国古代文体资料集成》,皇皇巨著,全面整理了中国古代对各种文体的讨论资料,勾勒出文体学的体系及其发展历史。

胡大雷《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视阈——读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学术研究》2012 年第 4 期)总结出现代意义文体学研究的“十法”:关注文体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创造性地发扬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探寻老生常谈之“常识”的价值;对文体和文体学内在运行机制的探寻;从对立面的辨析中看古代文体发展的相反相成关系;文体学研究注重对文学史的贯穿;通过小中见大而对规律、通例的追寻;发现或引发出启发意义极大的新问题;对文体学研究的文体的关注;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中关注文体学。

总之,近三十年来的古代文体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基本内涵、文体学

学科构想与建设、文体形态研究、文体分类研究、文体史研究、文体学史研究等方面。概念界说越来越明晰,体系建构越来越完善,各具体文体理论研究不断拓展,专题研究越来越深入,成绩喜人。但仍有不少研究和创新空间,古代文体学研究仍是进行时态。

有世界文体学,有中国文体学,有中国现代文体学,当然,也有中国古代文体学。笔者浅见,古代文体学是探讨古代文章(大文学)文本形态、本质精神、体制特色亦即研究其体制、语体、体式、体性、体类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是一门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原则和方法的学科,具有完整、独特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相对独立性,是一门横跨众多学术领域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古代文体学研究可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学理论、美学、心理学、哲学、史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考古学、文献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突破学科间疆界。

古代文体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与古代文体有关的一切学问,狭义则指古代文体批评和理论,指文体研究及研究之再研究。本书主要用狭义文体学概念,同时亦论广义文体学。本书既是古代文体理论的研究,又是古代文体的理论研究,既是古代文体史的研究,又是古代文体批评、理论及研究之再研究。集中于古代文体学一些重要概念辨析,注重文体特征、文体理论分析评价以及文体学学术史梳理,重视概念提炼、学术命名和深度探讨,特别注重学理思辨和反思,故名《古代文体学思辨录》。

本书不求面面俱到,是以板块和专题形式进行相对系统的探讨,分两大板块,共四章,前两章为文体学总论,后两章为文体学分论,具体论述散文、骈文、小品、赋、诗、词各文体理论。

第一章《古代文体学体系的建构》,是对古代文体学体系学理构成的思考。先总论古代文体学的学理构成,强调古代文体学应大体包括文学文体学、文章文体学与文化文体学三个层面,具体指文体形态学、文体起源学、文体命名学、文体范畴学、文体分类学、文体史学、文体创作学、文体艺术学等,是一完整独立而又开放的学科体系。古代文体概念,类似西方文类概念,西方文体(style)概念,则类似古代风格概念。不存在纯粹的“文学文体”,也没有纯粹的“应用文体”。以内容、风格、功用为标准界定和划分文体,是片面的,宜以体式为标

准。文体分类,“一分为三”比“一分为二”更合理。现代文体分类四分法,与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相差较大,造成流弊。文体在不断新生与淘汰过程中发展,文体演进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纯洁性与包容性、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的统一,它如同一条连续不断的长河,前后古今不是沟、界,而是环,环环相连。

接着专门梳理评价古代文体“自娱”功能论。古代文体有各种功能,如歌颂、讽刺、教化、言志、交际等,娱乐也是一重要功能,历代不少文人总论文学“自娱”功能,更多的是分论各文体“自娱”功能。“自娱”不只是文体文本的功能,不只是存在于文体阅读和接受过程中,它存在于文体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自娱有“形而下”与“形而上”之分,有雅、俗之别。古代文体“自娱”功能论是对主流文体功能观的反叛、疏离,可弥补其局限性,属“在野”的非主流的边缘的文体功能观,历代皆受到主流文学观话语霸权的鄙视、贬斥和否定,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它在古代文论中应有一席之地,研究者应给予充分重视,但不能矫枉过正,一味拔高,文学仅仅“自娱”是不够的,也是缺乏生命力的。

再是古代文体价值论。“文体价值”是指各具体文体的价值,有别于“文学价值”,即不同文体的共同价值。古代文体价值观念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经”的价值至高无上,地位独尊,从文体的本源着眼,正统文人认为所有文体均可溯源至“五经”,或者说正是“五经”生成了众多文体。在古代文体谱系中,常以文体排列先后顺序暗示文体的价值高下。文体有“原生”价值与“衍生”价值之别。文体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价值增、减、变异,大体上看,词、戏曲、小说三体价值,历代递增,“层累”提升,一些应用文体,如诏、策、奏、启等,则价值“递降”。文体价值观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别。文体的价值,包括当世价值和后世价值、原生价值和衍生价值、时效价值和恒久价值、正价值和负价值,只有将这些结合起来综合评价,才是合理公正的。

古代文体学是一开放的体系,这一体系的学理建构,学界同仁如吴承学、郭英德、钱志熙、曾枣庄等先生,皆有系统论述,见解深刻,使得这一体系不断完善。笔者暂时发此浅见,许多方面来不及论述,只得以俟来日。

第二章《古代文体特征论思辨》,是对古代文体特征论的多维透视和评价。古代文体有其内在规定性,又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历代学者喜文体疆界

及异同之辨。古人多主张严分文体疆界,重文、赋、诗、词、曲之别,古文、时文或今文之别,重“辨体”。也有不少文人学者反对严分文体疆界,强调文体间相通互融,如有人主张从音乐角度看,诗、词、曲三者本为一体,无须强为划界,如“衍生态”的词、曲相互渗透、融合,词的“曲化”,曲的“词化”,雅的“俗化”,俗的“雅化”,两者从内容、风格上已很难区分,这时形式格律便成为区别的主要标志。古代成熟定型的文体,一般称作“正体”;文体又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出现“变体”。历代文体“正”、“变”之辨不断,“正体”强调文体传统原来如此,大多数人普遍认可,是“正统”意识、崇古意识的反映,以古为准,唯古是尊。正统文学观念,“变体”创作要以“正体”为准,当以古“化”今,以旧“化”新,以上“化”下,以尊“化”卑,以雅“化”俗。也有相反情况,如以“时文”为“古文”,正宗古文“小品化”,诗的“词化”,词的“曲化”,以下“化”上,以卑“化”尊,以新“化”旧,以俗“化”雅,此点学界重视不够。文、赋、诗、词、曲各体,多有正体、变体之分。主流正、变观念,崇“正体”,贬“变体”,重视“本色”、“当行”,从创作上看,利于保持文体的纯洁性,但同时也阻碍了文体创新。古代文体有正体,有“破体”,“正体”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些天才文人对规范有所突破,有意求变求新。所谓“破体”,即破除各文体间的壁垒,淡化其固有疆界,各文体间相互借鉴,相生相融,可“出位”。对此文体而言,即将其他文体的特质与本色转介、移植于此文体中,促成文体再造新生。“破”指变化,即突破原来文体规范,创新文体。“破体”有时即指“变体”,有时是指“变体”的一种,多就具体作品而言,有独特内涵。各种文体皆有“破体”,如以赋为诗、以赋为文、以文为赋、以古文为四六、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等等。古代正统文人多强调遵守正体,反对破体。有的学者态度通脱,肯定“破体”。“破体”是文体“实验”,更是一种文体“冒险”,重在新变,本身未可厚非,主要要看改造得如何。

古代“文体”,内涵丰富,既是“文学”文体,又是“文化”文体,既别于现代文体,又别于外国文体,独具传统文化特色。有些文体并不是单纯的,而是兼具两种或两种以上文体特性,或是不同文体的组合,可称“复合”文体。“兼体”,即不是纯粹单一的文体,如骈、散兼体,即骈中有散,散中有骈,亦骈亦散,很难明确划分是散文还是骈文。“合体”,即一篇作品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文

体构成,浑然一体,是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如墓志铭。“文体语言”,是文体的标志,也是其独特价值的体现。文体语言深具文化意蕴,如近代文体语言革新与思想革新、文化革新“对应”关系密切,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文体革新,仅仅理解为语言层面的改革,是肤浅的。“文体风格”,是此文体区别于他文体的标志,各文体皆有独特风格,有其内在规定性,以区别于其他文体。文体有“正体”风格,还有“变体”风格,如“诗庄词媚”,词“婉约”曲“豪放”,词的正体风格是婉约而不是豪放,曲(散曲)的正体风格是豪放而不是婉约。文体风格是稳定性、绝对性与变动性、相对性的统一,是“常态”风格与“变态”风格的统一,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古代文体的地域特征非常明显,特别是南北差异很大,应重视文体地理学研究。古代每种文体皆有内在规定性,存在程式化特点。古代文体具繁杂性,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书启一体名义上即十分繁杂,分书、启、疏、奏、尺牋等,尺牋的别称即非常多,如刀笔、书、札、简等。“告语”类文体有上、下、平之别,诏、策、谕、制、诰、命、令、教,是上告下;章、表、奏、议、上书、疏、封事,是下告上;书、简、牋,是平告。古代文体与时代政治、学术、宗教、语言、文化等关系密切。古代文体演进,不同时代有不同特征。现代学者以西方“进化论”观念论文学史,过重创新,重新文体而轻旧文体,将新文体等同于新文学、优秀文学,认为只有新文体才能代表“一代之文学”,故宋词才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是传统主流文体等级观念的“颠覆”。古人往往以某种文体作为特定时代的代表,每时代皆有中心文体或称主导性文体,如汉赋或散文、六朝骈文、唐诗、宋文等,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认定何种文体最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要看有没有表现和代表“时代精神”?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如何?有没有深厚的文化意蕴?能不能充当时代文化“代言者”形象?若要推出宋代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文体,散文最为合理。古人重“文统”,排斥“异端”,“宋文”在“文统”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依此观念,如要选出某文体代表“一代之文学”,只能是散文,而不可能是其他文体,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更无法替代的。因此,宋人观念,“宋文”才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而“宋词”是无资格的。每一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代表文体,历代所谓“一代之文学”,基本上特指“一代之文体”,“一代之文体”可代表“一代之文学”,但不能代替“一